

“主义”的高度自信体现在“问题”的解决能力上

——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

宋友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 自信 问题 解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受访者简介]童世骏,男,1958年9月生于上海,1982年、1984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暨哲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其中包括《论规则》《中西方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概论》《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英文)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等。

[访谈者简介]宋友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国、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深刻总结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课题,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课题,本刊特推出对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的专题访谈。

宋友文: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发展壮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

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可以说,这是新形势下对“问题”与“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深刻论述。请问童教授,如何理解这一深刻论述?

童世骏:讲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三个月前刚刚在《新青年》上发表长篇文章“实验主义”的北大教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开篇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他看来,“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但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若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害人,还可能是“很危险的”。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在次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反驳。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理解习近平同志有关问题导向的观点,提供一个加深理解的特殊背景。

首先,“主义”是“问题”之提出的必要条件。什么事情被当做是问题,离不开某个视角作为依据;“主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只有在特定“主义”或社会理论背景之下,特定问题的提出,才成为可能。李大钊说“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包含着这个意思。

其次,“主义”是“问题”之解决的必要条件。“主义”不仅对于问题的提出,而且对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社会的大问题要解决,社会的大众就必须一起参与和努力,而离开“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社会大众就无法充分动员起来。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根本性的,有的是派生性的,在有的情况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都解决了的希望”。在李大钊看来,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第三,“主义”所要求的“问题”解决有不同形式。“主义”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哪怕没有完全解决,只要“主义”并没有只被当作空谈,而也成为实践的指导,就不能说是一无用处的:“……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就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主义”而言,它提出的实践任务是对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双重改造,是“成事”和“成人”的双重使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改造世界”或“成事”与“改造自己”或“成人”的这两个目标未必会同步实现;与“成人”的目标相比,“成事”的目标实现更取决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具备。李大钊说:“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段话,从字面上说未必精当,但其内在精神来说,或许可看做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成事在天、成人在己”,在一个并未完成的宏大事业中,个人的有限生命依然是可以得到升华和完成的。

第四，“主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适应环境、获得具体形态。在李大钊看来，把“主义”的理想变成现实，自然要求“主义”的主张者“因时，因所，因事的形势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同样，“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

宋友文：您刚才在回顾了上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基础上很好地诠释了“问题”与“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把强调问题导向、重视问题意识、解决实际问题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位置？

童世骏：以“问题”与“主义”之争为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的论述，更好地把这些论述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当中。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加强对“问题”的重视，有助于更新对“主义”的理解。中国人在近代之所以向西方学习，就是为了在遭受列强欺侮以后能寻找民族复兴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发现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同时也是解决民族复兴问题的最佳答案；中国人后来之所以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是因为解决民族复兴和社会革命的问题一方面为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而得到真正解决。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通过解决民族复兴、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这三大历史问题而丰富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既提高其中国化的程度，也提高其时代化的程度；既提高其理论成果水平，也扩大其大众接受范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指导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而且要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加强对“问题”的重视，有助于加强对“主义”的自信。习近平同志在强调“问题导向”的同时，也强调“目标导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任何“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是以李大钊等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奋力捍卫的那个“主义”已经确立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作为历史前提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明确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的今天，我们不用担心对“问题”的重视会压倒对“主义”的重视。恰好相反的，要防止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忽视，而造成“主义”的优势无法得到实际体现。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发挥“主义”的优越性的最重要途径，是解决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主义”的高度自信，只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能力和实际成效，才能得到名符其实的坚强支撑。

宋友文：您说的“主义”的高度自信要体现在“问题”的解决能力上，这是

对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强有力支撑,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制高点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有理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信。当然,这种自信不应该是关起门来的自信,更应该的是具有开放胸怀的自信。

童世骏:重视对理论和实践之中“问题”的导向有助于加强对“主义”的自信,不仅是在国内语境当中,而且是在国际语境当中。在国际场合,我们在解决了“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之后所面临的所谓“挨骂”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应对。所谓“挨骂”的问题,有的与敌人的恶意有关,有的与外人的误解有关,有的与朋友的失望有关。敌人的误解很难完全避免和化解,但可以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降低其攻击的欺骗性,缩小其攻击的影响面。为了解外人的误解、避免朋友的失望,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中一个途径,是恰如其分而又理直气壮地表明:国外的观察家和朋友们所指出的许多问题,不用根据他们的“主义”,而根据我们自己的“主义”,就已经是问题。不仅如此,国外人士议论纷纷的我国在居民收入、环境质量、社会活力、道德水准、文化品位等方面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主义”不仅也是问题,而且更是问题,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些方面的要求,比其他任何主义应该都更高才对。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理论很好很高,就忽视甚至掩盖自己的实践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样,别人也不该因为我们的现实与理想还存在相当距离,就对这种理想和“主义”横加指责。只要我们正在脚踏实地地认真研究和解决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缩小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我们就有理由对自己的“主义”保持高度自信。

宋友文:社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不断涌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不断在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推动理论创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请您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谈谈什么是中国问题?

童世骏: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对“民族复兴”“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三大问题提供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答案,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在今天的任务,是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项伟大工程,一方面在更高水平上回答“民族复兴”“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这三大问题,另一方面把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以前两次强调过的那个问题,“贡献人类”,放到更加显著的位置上,给出更加心安理得的回答。

毛泽东 1945 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所说的这个问题有一个著名名称，那就是“中国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问题”不仅是西方人谈论中国的一个常用话语，而且是中国进步人士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一个核心概念。早在 1904 年，孙中山用英文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迟至 1989 年，邓小平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在 1990 年，邓小平用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强调过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中国问题的关键”，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表达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的诸多形式当中，一种重要形式是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成就，在国内外有关中国的讨论当中，“中国问题”这个说法终于基本不大见到了。

但是，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不等于说“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一口气说了六个“如何”问题，涉及意识形态、发展方式、社会公正、治理体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总书记强调，对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更好发挥作用”，“也应该大有作为”。

宋友文：在当今世界，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问题，解决好中国问题还具有世界意义，换句话说，解决好中国问题就更有能力解决世界问题，就更有能力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童世骏：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贡献于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而且为“解决人类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习近平的这个论述，与毛泽东 1921 年 1 月 1 日和 2 日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的如下论述遥相呼应：“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问题导向”不再仅仅意味着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努力当中关注中国境内的问题，而且意味着要关注世界范围的问题。毛泽东在 1940 年讨论的那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现在越来越意味着“世界向何处去？”孙中山在 1916 年发出的那个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依然发人深省，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中国对“世界潮流”本身的影响，也已经越来越大了。中国对于世界的重大意义，英国哲人伯特兰·罗素早在 1922 年的《中国问题》就已经明确提出，但真正把“世界问题”作为“中国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把“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的一个部分提出来，现在才刚刚具备实际的条件。马

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地处东方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就已经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内涵,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宋友文: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只有回应时代的召唤,认真研究重大而深刻的问题,才能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历史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哪些是重大而深刻的问题?

童世骏: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在胸怀“世界问题”的前提下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下大力气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力求在这些问题上体现我们的“主义”的优越性和自信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大概是以下三个。

首先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命题中,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资本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作为“现代化”之重要内容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前面提到了李大钊的这个观点,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而“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这个理解,现在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不能误以为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其他问题就自然解决了——甚至可以说,现在强调“问题导向”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以后,还有大量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但毕竟,在宏观的层面上,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制度、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为什么可以在企业运行、收入分配乃至整个经济运作当中,让资本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考虑到全球范围内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现代性模式的种种努力,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的世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宋友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想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看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

童世骏: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现在往往是这样一个两极局面:根据有些理论,在现代经济生活甚至整个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资本的作用多多益善;

而根据另一些理论，资本是劳动的对立面，因此让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同时他也要求我国学者加强对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分析研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决议中，一个重要任务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对十三五规划建议进行说明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同时，进一步发挥“资本的活力”，或者倒过来，在进一步发挥资本活力的同时，明确资本活力的限度，用有效手段把资本活力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恰恰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深刻批判，是建立在它对“资本的活力”及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里面，明确提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度”的命题，这个命题，在我看来，为我们今天既拒绝资本主义、又发挥资本作用，提供了很好论证。同时，认真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经验，又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命题，对资本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作用，做出有时代高度的理解。

宋友文：可以说，刚才讲的如何对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必须要回应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实践中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命题的深刻依据。

童世骏：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命题中，“中国特色”要求重视特殊性，“现代化”要求重视普遍性，而“社会主义”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来说具有特殊性，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又具有普遍性。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事物的普遍性和事物的特殊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在任何个体身上，把它与其他个体归为同类的性质和把它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性质，在概念中彼此并存，在实际上彼此交融。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得好坏，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否顺利、是否成功，有极大的关系。1938年初，当代新儒家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毛先生你太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而毛泽东则说，梁先生你太忽视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了。但就在同一年的十

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可见,既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的普遍性而忽视它的特殊性,也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的特殊性而忽视它的普遍性;关键在于,要在理论上搞清原理、在实践中把握分寸。在目前,我们一方面要拒绝那些以“普世价值”名义而向我们兜售的已经可确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和制度,另一方面要虚心学习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成果;一方面要紧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国内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力争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正是克服了把“普遍”和“特殊”机械地对立起来,并且也避免了把这两者与“世界”和“中国”简单地对应起来。如果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那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对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还与第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即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命题中,“社会主义”通常被认为更强调“大同团结”,而“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更强调“个性解放”,而如何建设一个李大钊多次强调的把“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结合起来的社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最惊人预言之一,资本孜孜不倦地努力“用时间消灭空间”,已经变成当代世界的最突出特征之一;现代交通手段和交往手段的每一步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谈论的“加速度”现象,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减到超越“天涯若比邻”的地步。与此同时,科技和社会的双重进步及其复杂后果,又表现为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之间不仅因为利益差别、价值分歧而且因为认同相异而咫尺天涯,甚至同室操戈。现代政治的首要课题,可能就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也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已经不管好坏确实已经在技术上达到“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上,努力实现不同层面上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面对这个挑战,中华民族珍视世俗生活、推崇“以德服人”、主张“合情合理”的文化传统,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因为它特别有助于在这个技术手段已足以使人类及其文明毁于一旦的世界上,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当代著名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引用康德,说如果正义泯灭了,人类是否还值得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罗尔斯、康德的这种当然是非常崇高的道德立场,只有与一种不仅主张“将心比心”而且愿意“合而听之”的态度相结合,才不会在极端情况下被极端主义者盗用,从“既然在我眼中正义已经泯灭”的荒谬前提,得出“那我宁可全世界与我同归于尽”的恐怖结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说要寻求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这个观点在国内语境和在国际语境固然有非常不同的具体含义,但在

这两个语境中都同样体现了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

当然，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涉及态度和文化的层面；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必须上升到制度和政治的层面。前面说过，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当代中国的哲学应该对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同样，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宋友文：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和郑重嘱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五路大军，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主力军，承担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职责。请您谈谈新形势下高校如何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童世骏：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发表过自己的观点，这里再强调一遍。

首先，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用着力于把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结合起来，为追求真理、服务人民而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同时又通过高水平地解决问题和回答问题而体现政治优势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从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和在中国土地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实用主义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义和任务，同时又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直面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要直面这个领域中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建党将近百年之时，对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又一次回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尤其要下大力气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总体建设和思想辐射，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各个相关学科教学科研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吸取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充实更新和丰富发展。

其次，用着力于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统一起来，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所运用的方法和所体现的价值，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不仅讲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而且讲了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不仅讲了面向文科学生的专业教育，而且讲了面向全体学生的人文教育，对高校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在办学活动中要进一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发挥和水平提高，尤其是重视通过教师在学生面前展示的高水平的调查和研究、讲课和指导、论著和教材、启发和示范，扎扎实实地提高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人文素养和理性精神。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当代中国，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理

性精神,是为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和理性精神所采取的关键措施。

第三,用力于把学风建设与学科建设统一起来,一方面把科学理论成果和优良学术传统化为研究方法和学术德性,另一方面用更好的方法和德性促进更好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透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提得很明确。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尤其要重视改善学术评价制度及其执行状况,让学术评价的正确导向通过学术评价的合理标准和正当程序而发挥作用;尤其重视提高学术研究的队伍素质和工作能力,不仅靠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而且靠团队合作和集体智慧,力求产生出真正能经受实践和历史检验、能获得党和人民认可的学术成果;尤其要重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仅靠名家大师的个人魅力,而且靠学者群体的公共形象,包括他们在解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处理群己关系和义利关系、运用学术标准和遵守学术程序的过程中经受考验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赢得人民群众的敬重和后辈才俊的向往,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队伍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四,用力于把学术事业的本土使命与国际使命统一起来,既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向世界呈现一个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学术贡献的中国。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早已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了,而中国高校也无疑是我国参与国家间人文对话交流的主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合作的规模的增长,包括我国人文社科学者国外发表学术论著的数量增加,必须与质量的提升相伴随。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了让中国声音在世界上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我们既要运用好中国的话语权利,也要提升好中国的话语权力,在提高国际表达的内容质量的同时,改善国际表达的说话方式和传播形式,避免“说什么”所传递的信息与“怎么说”所传递的信息相互矛盾。最为重要的是要下更大力气钻研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用好中国资源,让中国智慧体现在研究的成果当中而不只是研究的前提当中,体现在今人的论著当中而不只是古人的典籍当中,体现在对重要问题的独到解答当中而不只是对别人成果的事后解释和评价当中。

前面提到,1956年,毛泽东两次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可以说是对毛泽东这句名言发表60周年的最好纪念。毛泽东当时的期待,“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我们已经实现了;为了在这样的时刻既肩负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又牢记毛泽东在表达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决心之后马上做的“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的嘱咐,我们必须通过在民族土壤上的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学术耕耘,为人类文明贡献出实至名归、问心无愧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蒋旭东]